

卷四

卷之三

中国相约的半生常死士

Zhongguo Zaixiang De
Feizhengchang Siwang

赤军著

赤軍著

綫裝書局

中国
宰相
的非正常死亡

Zhongguo Zaixiang de
Fei Zhengchang Siwang

赤眸齋

线装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宰相的非正常死亡 / 赤军著. —北京 : 线装书局,
2006.12

ISBN 7-80106-661-8

I. 中… II. 赤… III. 宰相 - 史料 - 中国 - 古代
IV. K827=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58728 号

中国宰相的非正常死亡

编著者：赤军

责任编辑：易行 孙嘉镇

装帧设计：春天·书装工作室

出版发行：线装书局

地址：北京鼓楼西大街 41 号 (100009)

电话：010-64045283 64041012

网址：www.xzhbc.com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

开 本：156mm×230mm

印 张：15.75

字 数：234 千字

版 次：2007 年 2 月第 1 版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：10000 册

定 价：25.00 元



前言

开宗明义，我们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：究竟何所谓“宰相”？

我们平常所说的“宰相”，其实并不是正式的官职名称。细查中国五千年历史，职官称为“宰相”的，只有辽代的北面官（管理非汉族事务的系统）有南北两府，首脑为南北宰相，除此以外，各朝各代都无宰相之官。然而虽无宰相之官，却有宰相之名——所谓宰相，是指辅佐国君、统筹大政方针的官职，而其正式官名，并不必叫做“宰相”。

宰相之名正式产生是在战国后期，《韩非子·显学篇》说：“故明主之吏，宰相必起于州部，猛将必发于卒伍。”宰相这种职务而非官名的正式诞生，也大致是在这个时期。夏、商时代，辅佐君主的是巫史，西周和春秋时代则是公卿，都来源于贵族，甚至可以世袭，不能算是宰相。从春秋时代开始，部分诸侯国开始设置非世袭的最高辅佐官，比如楚武王所设的“令尹”，齐桓公、秦穆公所设的“相”，都是宰相的雏形。

“宰”的本意，是指君主的管家，而“相”则是指辅佐。战国时代，各国的宰相名称很多，比如“相邦”、“相国”、“丞相”，等等。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，宰相的正式名称定为“丞相”，有时也分为左右，即“左丞相”和“右丞相”，如由宦官担任此职，则称“中丞相”。

——比如赵高。

西汉初年，延袭秦制，但另设“御史大夫”一职作为副宰相。后来汉武帝为了制约相权，起用一批儒生担任丞相，处理日常的行政事务，而将政务中心转移到内廷，此后的丞相即空有其名，却非真正意义上的宰相，而内廷的尚书台却逐渐发展起来，成为新的政务中心。尚书台的长官叫“尚书令”，如由宦官担任则称“中书令”，有时还以地位较高的官员加上“领尚书事”、“录尚书事”等头衔负责尚书台事务，这些官职逐渐变成了新时代的宰相。

东汉不设丞相和御史大夫，而以太尉、司徒、司空并称三公，作为朝臣的领袖，也即名义上的宰相。《后汉书·仲长统传》中说：“虽置三公，事归台阁。”所谓“台阁”，指的就是尚书台。

东汉末年，权臣董卓、曹操等人恢复了“丞相”或“相国”的官职，后来三国时代的吴、蜀沿袭其制，都是真正名实相符的宰相，甚至往往权力更凌驾于君主之上。魏晋以后，尚书台的地位稳步上升，逐渐从内廷独立出来，成为中央执行政务的总机关，改称尚书省。尚书台或尚书省的长官尚书令、副长官尚书仆射，权限与秦汉的丞相相等，成为真正的宰相。尚书省既然独立出来了，那么内廷就另设中书省，以代替过去的尚书台，中书省的长官中书监或中书令，其实也是宰相——这时候的中书令，就不一定由宦官担任了。此外，南北朝时又出现了一个名叫门下省的机构，掌管机要文件，其长官侍中也可能具有宰相之权，北魏就俗称这个官职为“小宰相”。

隋唐两代设三省六部，三省即尚书省、中书省、门下省，其长官都是宰相，副长官都是副宰相。然而宰相太多，决定难下，唐代就规定不加“同中书门下平（读如骈）章事”这个称号的三省长官，就不算是宰相。同时，某些官职较低的官员，还可以通过加上“参掌机事”、“参预朝政”、“参知政事”等称号行使宰相的职权。比如魏征，他在担任秘书监的时候就加“参预朝政”衔，可以算是太宗朝的宰相。

到了宋朝，情况又有所改变，三省长官都不参与大政方针的决定，

都不是宰相，另外设置内中书省，以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”作为宰相的正式名称，“参知政事”为副宰相的正式名称。元丰改制以后，称号变得极其混乱，比如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、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等等，甚至一度恢复了左右丞相的官职。

辽代官职分管理汉人事务的南面官和管理契丹等民族事务的北面官，很少有统筹全国的君主辅佐，所以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宰相。金代以尚书令、左右丞相和平章政事为宰相；西夏以国相为宰相；元代则以中书省的左右丞相、平章政事为宰相，左右丞、参知政事为副宰相。

明朝一开始沿袭元制，后来朱元璋废丞相之职，也等于废除了宰相之位，大政方针都由皇帝一把抓。不过这种局面终究无法长久，皇帝也不可能事事躬亲，原本的顾问官即文渊阁大学士职权范围日益扩大，仁宗洪熙朝以后逐渐演变为新的宰相。不过明朝阉宦横行，宰相职权经常被司礼监秉笔太监所篡夺。

清朝前期基本沿袭明制，到了康熙朝，加“南书房行走”名号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宰相，雍正朝设军机处总领政务，此后“军机大臣”就变成了宰相。

拉拉杂杂讲了这么多，只是想说明一个问题，即宰相是一种职务，而非正式官名，历代掌宰相职权的官职，沿革变迁，非常复杂。《历代宰相录》整理了近七百位宰相，但其实这些宰相中，可能还有一些虽有宰相之名，却并没有宰相之实的。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”、“文渊阁大学士”的称号也往往授予一些德高望重的老臣，但其实他们大多七老八十，根本就不管事了。

只有真正辅佐君主，进行大政方针统筹的，才能被称为宰相。汉文帝曾经询问右丞相周勃：“全天下每年处理多少案件？”周勃回答说不知道。文帝又问：“全天下每年钱粮收支是多少？”周勃还说不知道。文帝不满意了，改问左丞相陈平，陈平回答说：“这些问题，各有所司，陛下请去询问廷尉和治粟内史吧。”表示宰相根本就不该负责具体事务。

汉宣帝的时候，邴吉为丞相，出门看见路上有斗殴而死的人，问都不问，看到有头耕牛气喘吁吁，倒急忙下车来查看。从属问他为何轻人重畜，他回答说：“老百姓斗殴，自有长安令、京兆尹等地方官来管，宰相是不管这些小事的。现在还是春天，气候不会太热，可是这头牛却不停地喘气，我恐怕是天气有所反常。身为宰相，当然要管调和阴阳，总揽全局喽！”

这说明宰相有可能偶有兼职，但长时间负责具体事务的，未必是真宰相。而且宰相并不一定是朝臣的领袖，真正资格老、威望高、官位也高的，其实倒未必是宰相。尚书令最初品级很低，大学士最初不过七品，而且一直到明朝终结也还不是一品。清朝倒是正经把大学士列为一品了，然而没多久大学士也被从宰相的位置上扒拉了下来。

我写这本《中国宰相的非正常死亡》，首先就要把那些“假”宰相，有宰相之名却无宰相之实的朝臣都摘出去。比如东汉时代，朝臣名义上的领袖是三公，也即太尉、司徒和司空，但实际掌握政权的往往是大将军，大将军是武职，是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，有他需要具体负责的事务，所以如果大将军不加上“录尚书事”，兼任尚书台也就是内朝的首脑，他和三公相同，都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宰相。

权倾朝野，凌驾于君主之上，虽名为宰相，实际干的事情和皇帝没区别的家伙也必须排除掉。比如汉朝末年的宰相是谁？从官位上来考虑，可以有两个备选，一是丞相曹操，一是尚书令荀彧。然而曹操是当时的权臣，他这个宰相和帝王毫无区别，荀彧则主要辅佐的不是皇帝而是权臣曹操，所以两个人都只能被剔除掉。

最后，再把宦官们都剔除。除了秦朝宦官可以为宰相——是为中丞相以外，历朝历代都很少把宦官算作正式的朝臣，甚至明文规定“宦官不得干政”。宦官掌握宰相的职权，虽不罕见，在制度上却是特例，更不能够把他们都算作是宰相。

相权与君权的斗争，贯穿了整个中国封建时代。历朝官制中，宰相的变化最为频繁，无定职，无定称，无定员，三天两头在变，这是因为君



主不能没有主要辅佐者，不能没有宰相，但宰相的存在往往制约了君主的行动，君主就会故意弱化其作用，一般情况下就是在内廷另设一套班底，以分宰相之权，或者分置多位宰相和副宰相，使他们任何一个都无法威胁到君主的专断权。

从秦汉到唐宋，以丞相为宰相到变成以尚书令为宰相，进而以加某些特定名号的官员为宰相，正说明了君主另设班底以分宰相之权，然而这些新班底却又逐渐演化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宰相，这恐怕是最初设置这些新班底的君主所料想不到的。君主一人智力有限，历代君主贤愚也各不同，有能力的君主在位的时候，往往并不需要宰相，而当换上一个没能力的君主，没有了宰相他就寸步难行。因此宰相制度总是存在的，也总是在改变着的。

不过君主是世袭的，宰相却非世袭，因此普遍认为有能力的宰相要比有能力的君主为多。封建时代士大夫对于太平盛世的理想，就是君主只要有德行就行了，不必要有能力，这样可以依靠有能力的宰相而“垂拱而治”。这个理想固然很好，然而君主如果真的啥都不管，宰相一人说了算，又会引发相权的膨胀，最终宰相变成权臣，君主被完全架空，所以历朝君主都不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。

这是一个恶性循环，君权离不开相权，然而又要限制相权，相权是君权赋予的，然而又要制约君权，相权和君权的斗争，就此延续数千年，引发无数在今人看来很可悲或者很可笑的历史事件。在这种背景下，不得好死的宰相也就为数多矣。

宰相从春秋时代开始产生，到秦朝建立正式确立，等到皇帝下台，宰相当然也就没有了，可谓与封建社会相始终。历朝历代数百位宰相，贤愚各异，有忠臣、能臣，也有大奸大恶。本书所选择介绍的十五位宰相，他们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不得善终。不得善终有种种形式，也并不仅仅这十五人而已，但这十五人是最具有代表性的。他们的死，并不仅仅是个人命运的悲喜剧，同时也牵动着时代的脉搏，与王朝的兴衰更替紧密相联。

历史是具有多个侧面的，仅看宰相之死，恐怕无法看清历史的全貌，但不可否认，“上佐天子理阴阳、顺四时，下抚万民、明庶物，外镇四夷诸侯，内使卿大夫各尽职务”的宰相，其不得善终，对于历史全景来说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侧面。而从较小的角度来看，身为宰相，或受刑，或被杀，落得个如此凄惨的下场，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说，也有很好的借鉴意义。

无论是看历史，还是学做人，本书都希望能给读者以一定裨益，一定启发。如果达到了这个目的，那么这本书就是成功的，否则，哪怕文字再华丽，如天花乱坠，终究也不过是水月镜花而已。



目录：

前　言

- 商鞅：作法自毙 / 1
李斯：东门黄犬 / 20
窦武　陈蕃：党锢之祸 / 39
费祎：宴前血案 / 56
王衍：清谈误国 / 73
司马元显：少年宰相 / 90
长孙无忌：立后之怨 / 109
杨炎：大贤大奸 / 125
韩侂胄：投机罹祸 / 141
文天祥：取义成仁 / 159
阿合马：袖捶除害 / 178
脱脱：一杯毒酒 / 192
胡惟庸：胡蓝奇案 / 212
和珅：千古巨贪 / 226



商鞅：作法自毙

姓名：商鞅

所任官职：大良造

非正常死亡方式：被车裂于集市

车裂于市

公元前 338 年，远在西陲的秦国发生了一次奇怪的叛乱，叛乱的首谋者，就是被封在於商之地的前大良造商鞅。所以说这次叛乱奇怪，是因为叛乱者既没有割据自雄，也没有进攻秦国的都城或其他县邑，反而一路往北冲，去攻打郑国。秦王驷派兵前往讨伐，打败了叛乱的军队，最后竟然在郑国境内的渑池把商鞅给杀死了。于是历数商鞅的罪恶，下令把他的尸体运到咸阳集市，施以车裂的酷刑。



小篆 又名秦篆

车裂是一种古老的刑罚，即把犯人的头颈和四肢都用粗绳拴在车辕上，这种车可以是牛拉的，也可以是马拉的，一声令下，五辆车往五个不同的方向驶去，最终把犯人扯成数段。春秋时代和战国初期，中国人还大多不会骑马作战，战场上最强力的兵种是车兵，一般人行远路也都坐车。后来骑术发展了起来，战车逐渐被淘汰，有钱人出门的时候也大多骑马、骑驴骡，或者坐轿子，车的载人用途越来越小，所以车裂这种刑罚也有所改变，往往直接把犯人的头颈和四肢拴在牛或马的身上，民间就俗称为“五马分尸”。

按照商鞅自己制定的秦法，谋叛大罪确实应该被处以极刑，这里所谓的极刑，就是指车裂或磔（凌迟），大辟（斩首）之类算是轻的，不够惩罚这种罪恶。然而商鞅本是上一代秦王——秦孝公——最为信用的重臣，官至大良造，为秦国制定新的法律，并且切身管理和执行，还曾经

领兵出征魏国，大获全胜。论起商鞅的功劳来说，再大的罪过也可以抵消掉了，他又为什么会落得个如此凄惨的下场呢？

尤其是秦孝公去世还没几个月，太子驷登基也才不久，就突然把商鞅从宰相的位置上扒拉下来，然后以谋反的罪名将其车裂于市，这绝非顺理成章的事情，一定含有政治斗争的因素在内。

更奇怪的是，据说在商鞅的治理下，秦国国力大盛，百姓们“家给人足”，照理说，秦人都应该很感谢商鞅才对，眼看到商鞅被处以极刑，他们应该感觉悲伤甚至是愤怒。然而据说秦人对于商鞅之死，却并没感到有什么不妥，他们是已经麻木了吗？还是实际上他们很痛恨商鞅呢？

对于商鞅之死，历朝历代都有很多截然不同的评价，虽然大家都知道他死得冤枉，然而绝大多数人却认定他死得活该，是“作茧自缚”、“作法自毙”。再提到商鞅的为人和历史功绩，有人将其贬得一文不值，说最终秦朝灭亡的根由最初就是由商鞅种下的，也有人把他抬到天上去，曰其为改革家和烈士。

还是让咱们来拂尽历史的重重迷雾，尽可能地还商鞅以本来面目，并且重新评价他的死亡吧。

荐贤和杀贤

首先要说明，商鞅其实并不姓商，商只是他的氏而已。现在人姓、氏不分，在秦汉以前的贵族社会里，那可是区分得很清楚的。一般情况下，女子称姓，这个姓是表示她的血缘传承，所谓庄姜、孟姜，都姓姜，妲己姓己，没有名字，庄、孟、妲乃是她们的称号或者父亲、丈夫的称号。贵族男子称氏，因为氏象征一个人的社会身份和地位，所以平民百姓是无氏的。

商鞅实际的姓应该是姬，他是卫国的公子（诸侯的同族），而卫国乃是周朝的同姓诸侯，所以他的姓和周朝的国姓相同，都是姬。贵族男子称氏，所以他被称为卫鞅或公孙鞅——《史记》上说他是卫国的“庶公子”，也就是说和国君的血缘相距比较遥远，所以不能称“公子”，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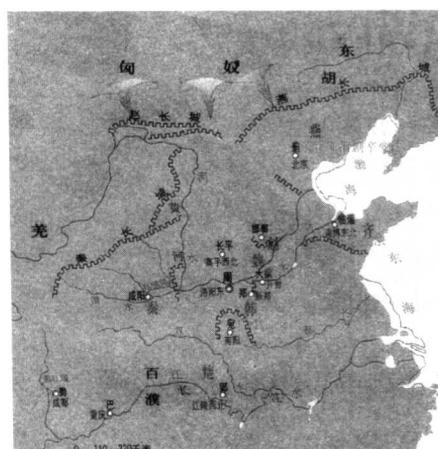
要称“公孙”。

商鞅的名号，则来源于他的封地。公元前340年，秦孝公赐给他於商的封地（在今陕西省商县东南的商洛镇），同时给予封号为“商君”。从此他就可以以封地为氏，称“商君鞅”，简称为商鞅。

姓、氏原本区分得很明确，等到秦朝统一天下，贵族社会来了次大颠覆、大清洗，很多王子王孙落难民间，再等到秦末大乱，刘邦、萧何之类的平民上了台，从此姓氏就混合为一，再也不加区分了。堂堂的史学大师司马迁都能写出商鞅“姓公孙氏”这种牛唇不对马嘴的话来，说明起码到了汉武帝的时代，人们大多已经把姓、氏的本源全都淡忘掉了。

拉回来说商鞅，他并非一开始就出仕秦国的，他的青年时代是在当时最强大的魏国度过的。据说此人很有才学，尤其喜欢“刑名之学”，也就是制定和执行法律法规的学问，从而受到了魏国相国公叔痤的重视。公叔痤又写作“公孙痤”，这说明他按血缘关系来算，乃是魏君的同姓远亲，按辈分来算，是魏君的叔父辈。

战国时代，最早希望通过法律而不是传统的礼教来约束民众，从而打破僵化陈腐的贵族社会的，乃是魏国。魏文侯任用名将吴起改革政治，国力达到空前的强盛，可以说，战国时代第一个称霸的不是后来的西秦，而是魏国。所以商鞅可以在魏国学到很多他所喜好的“刑名之学”，同时他也认为自己在魏国最有用武之地。



战国变法分布图

果然，公叔痤承诺说一定把商鞅推荐给魏惠王，有了相国的推荐，可以预见到商鞅的前途将会一片光明。然而好事多磨，公叔痤还没来得及兑现承诺，却突然生了一场大病，眼看就要呜呼哀哉了。

魏惠王听说此事，大感悲伤，急忙亲自跑到相国府上来探望公叔痤的病情。他流着眼泪问道：“万一您有个好歹，国家社稷可怎么办呀？”公叔

痤对惠王说：“您无须担忧，我府里的中庶子公孙鞅年纪虽轻，却有奇才，如果您能够委以治国之重任，对他言听计从，国势一定会更为强大的。”

中庶子本是国君、太子以及相国的秘书，官职不高，况且商鞅年纪也轻，毫无威望，又是个外国人，所以魏惠王对于公叔痤的推荐有点犹豫。如果公叔痤健康状况良好，他推荐公孙鞅做自己的副手，在自己的保护下和监督下主持国政，魏惠王一定会答应的吧。可是眼看公叔痤就要一命呜呼，听他的话分明是想让商鞅接替他做相国，这就使得魏惠王难以答应了。

所以魏惠王并不立刻答话，反而沉默了下来。坐了一会儿，惠王起身打算离开，始终不说自己是否采纳公叔痤的建议。于是公叔痤就让周围侍候的人都退出去，然后小声对惠王说：“您如果不愿意让公孙鞅主持国政，那就杀了他，千万别让他离开魏国跑到别处去！”

惠王这次应允了公叔痤的建议。等到出门以后，他叹息着对左右说：“公叔痤病得太厉害了，都胡言乱语了，竟然想让我把国家托付给一个年轻的外国人。”

而在公叔痤这边，他左思右想，感觉商鞅实在是个人才，如果因为自己最后那句话，魏惠王真的把他杀掉，那未免太过可惜了。于是他就把商鞅叫来，对他致歉说：“今天国君问我谁可继任为相国，我向他推荐了你，然而看他的表情，似乎并不想用你。我只能先国事而后论私交，建议说如果不能用公孙鞅，那最好把他杀掉，国君点头同意了。现在想起来有点后悔，你还是赶紧逃到别国去吧。”

商鞅却毫不担心，笑笑安慰公叔痤说：“国君既然不能听您的话重用我，又怎么会听您的话杀死我呢？不用着急，我不会有事的。”

正如商鞅所言，不久以后公叔痤去世，魏惠王封了别人做丞相，同时并没有遵照公叔痤的遗言加害于商鞅，仿佛根本就把这个人忘记了似的。虽然保住了性命，然而商鞅在魏国已经待不下去了，他失去了公叔痤这个最好的推荐人，以他年轻的外国人的身份，看起来很难再有大的发展，更不可能受到重用。于是他打点行装，打算去别国碰碰运气。

到哪里去才好呢？商鞅想到了秦国。

四见秦孝公

一般认为当时的秦国非常弱小,全靠着商鞅实行变法,才使秦国逐渐强大起来。但事实上秦在春秋中晚期就是西陲大国,秦穆公曾经称霸西戎,并且东向和霸主晋国多次对战。战国前期,从秦怀公到秦惠公等数代,内乱频仍,才略微有所衰弱。商鞅出生前后,秦国是秦献公在位,而这个时候魏国经过魏文侯、武侯两代的繁荣,也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。公元前364年,秦军大破魏军于石门(在今山西省运城县西南),斩首六万,乃是战国时代秦国对东方各国的第一次大胜利。

公元前362年,公叔痤曾经领兵大破韩、赵联军于浍水北岸,但随即遭到秦兵的袭击,吃了败仗,公叔痤甚至一度被擒。此后不久,秦献公去世,其子渠梁继位,就是秦孝公。秦孝公元年,也就是公元前361年,



秦孝公

秦又灭掉了位于今天甘肃省陇西地区的獮戎。

因此可以说,秦在当时争霸中原的各国中还是比较强大的,尤其秦的地理位置比较好,东临韩、魏,南接楚,两面向敌,西、北两面则多为外族小国,便于扩张和发展,比起三战甚至四战之地的韩、魏乃至宋、郑等国,要好得多了。但也正因为如此,时人都把秦国看成是偏远野蛮的外族所建立的国家,关东诸侯盟会从来不通知秦国。一句话,他们根本就看不起秦国。因此秦孝公才刚继位就下诏求贤,想要振兴国威,让关东诸国不敢再轻视自己。

商鞅听说了这件事情,就离开魏

国来到了秦国，他这次找到的推荐人乃是秦孝公的亲信景监，此人官职不高，或许能力也不算强，却很得孝公的信任，所以当时秦国的贵族们都不大看得起景监。商鞅通过景监的介绍得以见到秦孝公，这竟然也成为后世很多人诟病他的一个理由。

据说第一次见面谈话的效果并不好，商鞅讲得口沫横飞，秦孝公听着听着却打起了瞌睡。事后孝公还责备景监说：“你推荐的人尽讲些无用的大道理，我怎么可能任用他呢？”景监就去询问商鞅，商鞅说：“我向国君介绍为帝之道，看起来他的志向并不是以德行包容天下，所以根本就听不懂。”

过了五天，商鞅请景监帮忙，再次见到了秦孝公，这次他换了一套说辞，秦孝公不再打瞌睡了，然而仍然对他的言论不大感兴趣。事后孝公再次责怪景监，景监转过头来也再次责备商鞅，商鞅说：“我这回向国君讲述为王之道，还是讲不通。您找机会再让我去见一次吧。”

于是商鞅换了第三套说辞，第三次和秦孝公对谈。看起来这次的结果比较令人满意，事后秦孝公对景监说：“你推荐的人说得很有道理，我可以任命他为官。”商鞅也对景监说：“此次我给国君讲的乃是称霸之道，看他的态度，似乎可以接纳这种言论，我明白他的志向了，下回再见面效果一定更好。”

第四次见面，商鞅完整地阐述了这种“称霸之道”的理论以及实际施行的方法，秦孝公听得入迷，不知不觉中一点点往前蹭，和商鞅的距离越来越近。事后景监问商鞅：“你和国君谈了些什么？他非常高兴，愿意重用你。”商鞅回答说：“我起初和国君讲论帝王之道，尧舜之德，国君说：‘那些事情都太遥远了，要成就帝王之业也太缓慢了。贤君就必须亲身做出一番事业来，我怎么可能先打下基础，慢慢等待数十年甚至数百年之后，子孙们再成就这种大业呢？’于是我就把最便捷的强国之



秦简